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 库切《幽暗之地》的“去历史化”表征

林萍

(四川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文研究中心, 重庆 400031)

摘 要:历史地看,近代欧洲殖民扩张的发生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然而,在库切小说《幽暗之地》对殖民历史的重构中,殖民暴力仅仅被视为由于主体意志过度膨胀而导致的心理失常表现,与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并无内在关联。受叙述立场的束缚,小说没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去诊断殖民行为,揭示殖民主义的物质掠夺本质。小说对殖民历史的表征具有“形而上学”倾向,其本质是“去历史化”,与去殖政治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隐含了库切作为南非白人自由派作家对于帝国意识形态的矛盾态度。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去殖政治;“形而上学”;“去历史化”;叙述立场

中图分类号:I47.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5)01-0053-11

0 引言

小说《幽暗之地》(*Dusklands*, 1974)是南非作家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 1940—)的第一部非洲小说。小说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越南计划”,讲述了主人公尤金·唐恩如何疯狂地参与越南战争,并终致精神崩溃的故事。第二部分“雅各·库切之讲述”是小说的核心部分,讲述了一位 18 世纪的白人雅各·库切远征南非内陆、进行殖民探险的故事。虽然两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迥异,但是两个故事都对殖民历史进行再现,探讨了殖民主义的起源问题。作为 2003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和学界公认的后殖民作家,库切的后殖民立场引发了学界的争议,使他成为当今世界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争议的焦点是“后殖民美学与政治”的关系。学界一般认为,库切非洲小说的美学表征服务于非洲的去殖政治(Attwell, 1993; Head, 1997),而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则从第三世界的文化政治立场出发审视库切小说的美学表征,认为其非洲小说销蚀了非洲的去殖意图。如沃森和帕里的论文在深入分析库切非洲小说特征的基础上指出,库切的

收稿日期:2024-10-30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库切非洲小说中的帝国话语研究”(23SKGH19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林萍,女,四川外国语大学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后殖民文学、非洲文学和西方文论研究。

引用格式:林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库切《幽暗之地》的“去历史化”表征[J]. 外国语文, 2025(1): 53-63.

非洲小说屏蔽了真实的非洲世界(Watson, 1996: 13-36; Parry, 1996: 37-65)。客观而论,后殖民主义是基于欧洲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种种后果的反思,与殖民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本质上说,殖民扩张的核心是殖民征服,最典型地体现在殖民者对领土的占有与资本的掠夺,其根本缘由在于“资本的积累”,因为“资本积累必然引起殖民扩张”(马克思, 2009: 881)。这就为我们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审视后殖民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合理性。遗憾的是,国内外学界疏于这种探索^①。本文以库切的第一部非洲小说《幽暗之地》为研究对象,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审视和剖析小说对于殖民历史的美学表征与去殖政治的关系,回答小说为什么将殖民主义的起源仅仅定位在“形而上学”(metaphysical)层面^②? 小说的文本“空白”到底隐含了什么样的“潜文本”或“无意识”?^③ 以及这种“形而上学”的书写到底产生了怎样的文化政治效果等问题。

1 文本“空白”与去殖政治

马克思高度重视殖民的政治经济学。在《资本论》第1卷第25章《现代殖民理论》中,马克思集中阐发的观点是:资本积累必然引起殖民扩张。他指出:“‘系统的殖民’的最大秘密就在于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移植到殖民地。”(马克思, 2009: 881-886)但是,库切在小说《幽暗之地》中对殖民历史进行了重构,使殖民的物质驱动沦为文本的“空白”,导致殖民的资本掠夺本质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

为了更好地理解小说中文本“空白”的产生机制,我们先看看小说创作所依据的历史事实。小说的核心部分“雅各·库切之讲述”是对南非早期殖民历史的重构。该部分主要依据历史文献《讲述》(Relaas)创作而成。该文献记载了雅各布斯·库茨跨越格雷特河(Great River),深入南非内陆大纳马夸地区(Great Namaqualand)探险的过程。据该文献记载,1760年,雅各布斯·库茨获得荷属东印度公司时任总督瑞克·图尔巴(Rijk Tulbagh)的许可,进入南非土著桑人和霍屯督人居住的大纳马夸地区。1761年,总督图尔巴批准亨德里克·霍普(Hendrik Hop)上尉沿着同样的路线,进行第二次探险。这次探险具有官方性质,由雅各布斯担任向导与翻译。由于雅各布斯本人并不识字,他的探险经历后来经他口述、由荷属东印度公司的一名抄写员记录下来,形成《讲述》一文,并附上了雅各布斯的签名(Kannemeyer, 2012: 19-20)。以这份短文为原始素材,并同时参考其他历史文献如《布

① 早在1998年,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德里克中肯地指出了后殖民研究中的缺憾。他认为:“从后殖民文本中消失的,引人注目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革命的文本。”(参见Dirlik, 1998: 166)这种缺憾至今仍然存在。

② “形而上学”的英语为metaphysics,拉丁语为metaphysica,意为“物理学之后”。大体说来,“形而上学”主要具有两种内涵。第一是指超出经验世界以外。该义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一书。第二是指“非辩证法”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认为事物中没有矛盾,是永恒不变的。本文所使用的“形而上学”主要是指第一种含义,即超出经验世界,去除物质维度之意。参见冯契、徐孝通, 2000: 364。

③ 马切雷认为,文学文本中未叙述的“空白”通常隐含了作者的意识形态立场;伊格尔顿则认为,文本空白蕴含了作品的“潜文本”与“无意识”。参见Macherey, 2006: 147;伊格尔顿, 2007: 179。

林克的游记:进入大纳马夸土地的旅程》(*The Journal of Carel Frederik Brink of the Journey into Great Namaqualand*),库切创作了“雅各·库切之讲述”。虽然小说属于虚构文体,但是作者努力实现逼真可信的叙述效果,力使话语层面(即小说)与故事层面(即原始素材)的基本历史信息保持一致。因此,在该部分中,探险者姓名、探险地点、时间、路线,涉及的官方机构和文件等都与历史文献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实现了逼真可信的叙述效果。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重构殖民历史的过程中,殖民扩张的政治经济学维度,即有关资本积累、领土扩张等物质维度等却被明显地“抹除”,成为文本的“空白”。这些“空白”在经验世界里已然发生但却未见于话语层面,导致“信息缺损”或“信息不充分”的叙述现象。大致说来,小说隐而不谈的文本的“空白”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第一,隐藏着巨大经济利益的殖民发现。在历史文献《布林克的游记:进入大纳马夸土地的旅程》中,关于金矿、铜矿等矿藏的发现有着详细的记录。据该文献记载,在探险的第58到61天,雅各在南非格雷特河两岸发现了大量的沙金矿(Brink, 1947: 6-71)。同时,在“雅各·库切之讲述”的“附录”文件中,雅各也向荷兰东印度公司时任总督图尔巴报告他在格雷特河两岸发现了沙金矿,并且在离格雷特河约四天旅程的地方发现了岩金矿。但是,在小说的正文中,这些隐藏着巨大经济利益的殖民信息都被“抹除”。

第二,殖民探险过程中的经济动机。小说的“附录”提示,雅各·库切进入南非内陆探险的主要目的是猎杀大象。他为此专门向图尔巴总督申请了捕猎大象的许可证。但是,小说正文极少提及捕猎和抢夺大象,血腥的象牙贸易更是没有涉及。白人殖民者到非洲猎取象牙的经济动机在康拉德《黑暗的心》中得到了应有的强调。但是在《幽暗之地》中,捕获大象、获取象牙的经济动机似乎不值一提,不具有叙述价值。小说中,殖民探险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某种“精神追求”,满足一种“高尚”的嗜血兴趣。

第三,殖民冲突事件中的物质驱动因素。小说叙述了两起殖民冲突事件:20世纪美国入侵越南,18世纪欧洲入侵南非。在对这两起事件的叙述中,殖民冲突的物质驱动因素几乎处于缺失的状态。以第二起事件即18世纪欧洲入侵南非为例。主人公雅各于1760年对南非大纳马夸草原的村民实施了血腥残忍的大屠杀。这次“屠村”事件是“雅各·库切之讲述”的核心历史事件。小说以“仇杀”为主题建构了情节。1760年,雅各带着他的五位仆人,乘着牛车、拿着步枪来到了南非内陆。一天,雅各发现自己身上长了一个大痈疽。当他在溪水旁割开痈疽并涂抹油脂时,被一帮土著小男孩发现。调皮的男孩子们挥舞着他脱下的裤子,迅速跑开。他如一头狮子般怒不可遏,拼命追赶那些男孩。狂怒之中,他用钢牙咬下一个男孩一大撮头发和一只耳朵。很快,孩子们的家长赶来,将他赶出了大纳马夸村。于是,在返回的几个月中,雅各一直念念不忘自己遭受的屈辱,想象着报复的那一天。1761年8月16日,他与亨德里克·霍普上尉开启了他的复仇之旅。最后,整个大纳马夸草原上

近50座茅屋的霍屯督人,以及他的四位仆人遭到血腥屠杀,无一幸免。在对整个大纳马夸草原的村民实施大屠杀以后,他感叹道:“他们的死验证了我的存在。”(库切,2007:144)^①不难发现,在小说的历史重构中,殖民暴力的发生与殖民的政治经济学几乎毫无关联。

在“雅各·库切之讲述”中,库切呈现的历史是18世纪中晚期的南非历史。据历史考证,在这段历史时期,荷兰殖民者与桑人和霍屯督人等南非土著爆发了各种流血冲突事件,其根本原因几乎都是为了抢占土地、牲畜和矿藏等资源(Vaillant, 1796:297-298)。欧洲的资本主义最初在荷兰萌芽。荷兰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主要依靠海上殖民掠夺积累资本,而南非是荷兰殖民扩张的必经之路和中转站。1657年,荷兰将南非开普地区由中转站演变为殖民地。自那以后,他们不断向南非内陆扩张。荷兰裔殖民者(即布尔人)向南非内地的扩张过程就是他们侵占南非土著土地、牲畜、矿产等资源的过程。整个18世纪,布尔人运用武力掠夺、驱赶和征服等多种手段多次掀起土地扩张高潮。据统计,在1768—1778这10年期间,南非内地猛然增加了1385个白人大农场(郑家馨,2010:附录二)。失去土地以后的南非土著成为白人农场的雇工或涌入城市成为居无定所的廉价劳工。南非白人统治阶层从物质剥削中积累的经济实力使得南非的“种族隔离”(apartheid)得以长期维持。但是在小说的历史再现中,殖民扩张的这些物质掠夺历史被明显地“抹除”。

据当代西方左翼学者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的研究,帝国统治有两种不同的权力逻辑形态,一种是领土逻辑(territory logic),即将权力等同于他们占领的领土范围,而把财富/资本看作追求领土扩张的一种手段或者副产品;另外一种则是资本逻辑(capital logic),即将权力等同于资本积累,而把领土的获得视为资本积累的手段或者副产品(Arrighi, 2010: 34)。在对南非殖民化的过程中,荷兰以及后来的大英帝国充分实施了这两种相互关联的权力逻辑。但是,在库切对南非殖民历史的重构与想象中,殖民扩张的起源似乎与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都没有太大的关联。

2 “形而上学”取向与去殖政治

如上所述,在重构殖民历史的过程中,库切抹除了殖民者的政治经济学动机。库切对于政治经济学动机的抹除与其对西方主体主义(subjectivism)理论话语的依赖有一定的关系^②。受西方主体主义话语的影响,库切认为殖民暴力主要是一种主体意志过度膨胀而导致的心理失常(mental disorder)反应。在他看来,主体主义的心理模式导致殖民者心理失常,从而卷入殖民暴力而不能自拔。因此,库切将叙述焦点完全分配在纯粹的心理学层面,

^① 以下引用该小说仅在夹注中标注页码。

^② 拙文以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小说为个案,详细论述了第三世界文学对西方理论话语的过度依赖所存在的问题。参见《捆绑之误与认同之殇——拉什迪“世界主义”批判》,载《外国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第194-207页。

其殖民历史重构呈现出与经验世界疏离的“形而上学”倾向。

西方现代主体主义哲学起源于笛卡尔。笛卡尔哲学开创了西方哲学由“外”向“内”的转向,即从朴素的客观主义转向先验的主体主义(胡塞尔,2002:7)。对于笛卡尔而言,主体总是思考的、理性的主体:“严格意义上说,我就是一个思考者,换言之,我即思维(mind)、智识(intelligence)、智力(intellect)和理性(reason)。”(Descartes, 1984: 18)从笛卡尔主体主义出发,主体总是起源,是第一性的;客体总是派生,是第二性的。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之中,主体总是优于客体,处于统摄和支配客体的中心地位。虽然笛卡尔的主体理论确定了主体和理性在西方现代文明话语中的地位,但是笛卡尔式心/物、主体/客体、意识/物质的紧张对立甚至敌对的关系给主体带来了心理问题。在主体对客体的探求、把控和宰制中,主体压制自己的本性,牺牲自己的“内在自然”,逐渐表现出自我分裂的症状。笛卡尔主体主义思想在尼采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概念中到达了高峰。主体主义导致的主体/客体的分离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根本问题。因此,对主体主义的反思和修正成为西方后现代理论话语的重要内容。

小说《幽暗之地》将西方学界内部对主体主义进行反思和修正的后现代话语“移植”到非洲的殖民语境之中。库切的非洲小说成为对主体主义话语进行反思和清理的场所。两位殖民者都呈现出以主体主义为核心的心理模式。主体主义的两个重要内涵,即主体的第一性和主体的分裂在小说两位主人公的身上都有较为集中的体现。在库切看来,正是主体主义的心理模式导致不同时代的殖民者卷入殖民暴力。在笛卡尔和尼采式心理模式的驱使下,殖民者将自身束缚于主体/客体、殖民者/被殖民者的对立结构之中,无法停止主体意志的膨胀,最后只有陷入精神分裂的状态。那么具体说来,库切是怎样将殖民者形塑为主体主义思想的载体呢?

殖民者被塑造为“自大妄想症”患者,沉迷于各种夸大现实的“妄想”之中。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症状是“妄想”(delusion),而“妄想”症状的表现就是具有“自我中心”(egocentricity)与“外控”(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的特点。换言之,“妄想”患者无法区分内在“想象”以及外在“现实”,往往会把“想到的事”当成是“真实发生的事”(贝克,2011: 55-56)。“自大妄想”是“妄想”的一种,患者通常认为自己拥有非凡的才能、智慧、财富、权力和地位等(郝伟,2013:18)。小说“越南计划”部分中的主人公唐恩是一位参加美国对越战争的学者,参与了美国国防部越南作战计划的编撰。他不满足于在国防部缓慢地升迁,终日将自己想象为“生机勃勃的勤奋的天才”和“对战争科学做出显著贡献的军事专家”,希望早日取代自己的主管。可以说,唐恩是一位典型的“自大妄想者”。同样,小说第二部分“雅各·库切之讲述”的主人公雅各的心理状态也具有“夸大妄想”的特征。他把自己想象为非洲土著霍屯督人的“父亲”,认为没有了他,他们就不可能活下来(85)。当他骑在马

上、阳光从他双肩照射下来时,他把自己想象为“一尊神,是他们所未见到过的神”(94)。他还时常沉溺于自己是非洲荒原“万物之主”的冥想之中,回味他所杀戮的生命和尽收眼底的新土地:“我的视线无所不及,我是万物之主……携枪驰骋荒野,眼光敏锐。”(104-105)

在“自大妄想”的驱使下,小说中的殖民者呈现出确认“殖民主体”的强烈“意志”。“意志”(volition)是人类特有的心理现象,而“意志过强”是“意志障碍”的一种体现(郝伟,2013:23)。小说《幽暗之地》中,“意志过强”是殖民者的典型心理状态。小说第一部分“越南计划”表明:美国不惜一切代价击败越南是因为他们有着实现“自我”的强烈“意志”。在“越南计划”的序言中,叙述者唐恩说道,美国士兵携带着枪炮进入越南,目的是“给他们带来那可怜的自我,仅仅想求得他们的认可”(26)。他自己对于帝国事业的热情并不出于某种物质“私利”,而是一种“历史使命”的驱动,是源于身体内部某种“激动着、兴奋着”的精神力量(44,47)。同样,雅各也呈现出确认“殖民自我”的强烈“意志”。雅各于1760年7月18日离开其住所,拿着步枪,乘着牛车,带着五个霍屯督仆从人激情澎湃地深入南非腹地。他大肆地杀戮非洲荒原的各种动物,其目的不是为了狼皮熊胆、虎骨象牙等物质,而是为了确认“主体”的存在感和价值感。他觉得自己一生的成就就是“不倦地在证明这些死者为异类”(106)。他认为“把子弹射入树身毫无意义,树不流血,安然不动”,相反,观看并体验动物垂死挣扎、流血死亡的场景才让他感觉到“自我”的存在。在雅各看来,他的猎狗吃的是野兔的肉,但他从野兔的死亡中获得了“形而上学的肉”,因此他的“灵魂不致囿于世俗”(107)。同时,他认为非洲土著霍屯督人将他从村里赶走,是在与他进行一次心理“竞赛”。他将自己回家召集人马也视作一次与霍屯督人的心理“较量”。他认为,在一个民族与另外一个民族的较量中,懂得“心理上”的突破是最重要的(131,133)。

小说进一步暗示:殖民暴力是殖民者确认主体性的必要手段。小说描述了唐恩对于暴力的依赖。唐恩自认为对战争科学颇有研究,极力推崇暴力化的越战心理策略。他的公文包里装有美国军方提供的照片。照片上的内容血腥残忍,呈现了美军在越南的各种暴行。他声称,他的写作依赖这些照片。在他思路凝滞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些血腥的照片取出来。他认为,那些暴力场面会给他衰竭的想象力“增添些许电脉冲”,让他的研究“不受束缚、重获自由”(19)。同样,雅各也将暴力视作实现精神“自我”的必要手段。小说反复强调了他对枪的依赖。但是他认为,他对枪的需要是“形而上的,并非是物质的”(106-107)。正是倚靠枪作为工具,他杀人如麻、残忍无比,并因此收获了作为殖民主体的存在感和价值感。

如上所述,在小说的呈现中,不同时代和地域的殖民者内心都有着笛卡尔和尼采式主体主义心理模式,即通过殖民暴力在精神上征服被殖民者,以达到建构自我主体性的目的。在这种心理模式的影响下,殖民者将自身束缚于主体/客体的对立结构之中,把被殖民者视

为永远具有威胁性的异类或他者。他们无法停止主体意志的过度膨胀,最后只有陷入精神分裂的状态。

毋庸置疑,小说《幽暗之地》对于殖民主义的残暴有所揭示和反省。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我们不难发现小说对殖民历史的表征与去殖政治仍然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小说对于殖民历史的“形而上学”取向未能揭示出殖民主义的资本掠夺本质。本质上,殖民主义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领土的征服和财产的掠夺。但是,小说抹除了殖民动机的经济维度,对殖民者行为驱动的探索主要是在纯粹心理维度上进行的。在库切看来,欧洲近代殖民主义的发生主要是源于主体意志的膨胀,源于笛卡尔和尼采的主体主义哲学。小说中的主体意志是一种抽象层面上的主体意志,与殖民扩张的物质动因并无多大关联。不难看出,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缺席,小说反思和诊断殖民行为的方式未能触及殖民主义的物质掠夺本质。诚如南非作家戈迪默所说,南非需要一种“物质正义”(Gordimer, 1998: 145)。毕竟,不承认资本的基础性地位,任何解放实践都难以形成自身的认知路径和抵抗策略(Dirlik, 1998: 356)。

小说对于殖民主义起源的“形而上学”取向凸显了殖民者的精神困境,忽略了对被殖民者困境的关注。通过大量描述殖民者主人公的“意识流”,小说呈现了笛卡尔和尼采式殖民者遭受的精神痛苦。具体说来,小说从以下两个方面凸显了殖民者的精神困境。其一,殖民者不能逃脱殖民扩张的天意。小说暗示读者,殖民扩张是一种天意,是西方人命中注定的一种行为;不同历史时代的殖民者几乎不可能逃出这种历史力量。殖民者内心不可克服的“幽暗之地”是“先验”存在的,根植于西方文化之中。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开始,唐恩说道:“我叫尤金·唐恩。我不得不那样。”(2)在该部分结尾之处,唐恩呼应了开篇无可奈何的语调:“我深深盼望着能弄清楚我是谁的过错。”(72)同样,雅各也被塑造为“担当起扣动扳机的人”,只是“历史手中的工具”而已(144)。由此推断,无论是对于被殖民者还是具有一定良知的殖民者,对于殖民行为的抵抗都是徒劳的。他们都不再具有本体论上的自由,仅仅在殖民权力体制中机械地履行某种特定的功能。其二,殖民者不得已才使用暴力。以雅各为例,在殖民者/被殖民者、心/物,以及主体/客体的对立关系中,雅各感到了巨大的痛苦和孤独。非洲荒野的空旷与他内心的虚空和孤独经常产生共鸣。他认为,他受到了野蛮的非洲土著的伤害和凌辱才不得已使用血腥的暴力。这可以从他对枪的独白沉思中体现出来:“枪代表了自身以外的借以生存的希冀,枪是抵御孤立无援的终极防身之物。”(106)不难看出,小说的殖民者不再是纯粹的贪婪无耻、冷酷无情的形象。相反,他们是笛卡尔和尼采式的殖民者:激情澎湃、意志昂扬、敏感内省和孤独痛苦。他们之所以行凶作恶,参与殖民暴力,那是因为他们“历史手中的工具”而已。正如雅各所言:“这仿佛是命

运的安排,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吧。”(109)总之,通过唤起读者对笛卡尔和尼采式殖民者精神困境的同情与共情(empathy),库切为殖民者的开脱之情暗暗地渗透在小说《幽暗之地》的字里行间之中。因此,库切的非洲书写能够赢得西方读者和批评家的青睐,但是对于非西方读者,尤其是非洲读者却感到颇有些隔膜。

3 “形而上学”取向与叙述立场

小说《幽暗之地》的“形而上学”取向隐匿了殖民主义的物质掠夺本质,凸显了殖民者的精神困境,流露出作者为殖民者的开脱之情。从文化政治的视角出发,库切对于殖民历史的这一呈现方式与其叙述立场有着密切的关联。

库切生在非洲,长在非洲,是非洲人,但是对于非洲,库切并没有太多的眷恋,缺乏一种归属感。在南非,由于种族隔离制度的实行,南非的白人与黑人都各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可以说,在库切生活的世界里,非洲黑人基本上不在库切的情感域之内,属于不可感知之物。正如库切自传中的女友索菲所言,库切采取了“相当抽象、相当人类学的态度去看待南非黑人。他对南非黑人并非怀有情感……他们也许跟他同为这个国家的国民,但他们不是他的乡亲……在他的潜意识里,他们总是相对于‘我们’的‘他们’”(库切,2013:243)。因此,在文学创作中,库切选择了殖民者的叙述视角和立场。在最近披露的创作手稿^①中,库切坦言:“我所有的小说都有个根本缺陷:我没法把立场从压迫者转向被压迫的一方。”(阿特维尔,2017:138-139)

追溯小说人物雅各·库切的原型可以为我们理解库切的叙述立场提供一些线索。据库切传记作者坎尼米耶考证,历史上的确有雅克布斯·库茨(Jacobus Coetse)这样一位殖民探险者,他就是小说人物雅各·库切的原型。更重要的是,雅克布斯·库茨与作者还有亲缘关系,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库切祖先(Kannemeyer, 2012: 17-20)。那么,雅克布斯·库茨是一位什么样的殖民探险者,有哪些殖民探险行为呢?这还得从库切的家族历史说起。

库切的家族历史是布尔人殖民开拓历史之缩影。库切于1940年出生在南非开普敦一个布尔人家庭,是南非荷兰裔殖民者后代。库切家族的第一代成员德克·库彻^②(Dirkouch)是欧洲荷兰人,来到南非开普定居并建立了大农场。在他的十个孩子中,大部分人选择待在相对安逸舒适的开普农场,但是他的子孙后代中,很快便有人萌生了探索南非内陆、开疆拓土的愿望。这个人就是第三代成员雅克布斯·库茨。雅克布斯·库茨生于1730年的南非开普。在库切家族中,他是一个充满激情、雄心勃勃的人,以其殖民冒险和

① 库切的创作手稿存放于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兰瑟姆中心,库切的合作者大卫·阿特维尔(David Attwell)将其整理出版,书名为《用人生写作的J.M.库切》(*J. M. Coetzee and the Life of Writing*)。

② 据库切传记作者坎尼米耶考证,德克·库彻将自己的姓氏改为库茨(Coetse),但其后代普遍采用Coetzee的拼法。请参见J. C. Kannemeyer(18)。

探索精神赢得了整个家族的尊敬和喜爱。在荷属东印度公司时任总督图尔巴的许可下,雅克布斯·库茨于1760深入南非内陆进行考察和探险。1761年,总督图尔巴批准雅克布斯·库茨与上尉亨德里克·霍普沿着同样的路线进行第二次远征。雅克布斯的探险经历形成了《讲述》。从那以后,库切家族的一些成员开始不断向着南非内陆地区开疆拓土、集聚财富。在美国德州读博时,库切偶然之间发现了自己的祖先雅克布斯·库茨留下的历史文献《讲述》。以此为契机,他开始追溯家族历史,开始小说《幽暗之地》的创作。

可以说,《幽暗之地》不只是一部纯粹追溯和反思殖民罪恶的小说,它也是一部库切追忆祖先的怀旧之作。库切在创作手稿里写道:“在最早一批冒险进入非洲南部腹地、带回流传后世消息的英雄人物里,雅克布斯·库茨虽然光荣可敬,却极少被人提及。”(Attwell, 2015: 26)这是库切为小说主人公雅各的大体定位,也大体确定了库切的叙述立场。从殖民者立场出发,作为殖民利益的分享者,库切对殖民暴力的审视和反思很难触及殖民扩张的资本掠夺本质。

回溯南非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政治局势,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库切小说的叙述立场,以及这一立场与小说“形而上学”取向的关联。当库切于1971年从美国返回南非,继续从事《幽暗之地》的创作时,南非的社会局势仍然动荡不安。在震惊世界的“沙佩维尔惨案”^①爆发以后,南非左翼政党即非国大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逐渐摆脱南非白人自由派中间路线的影响,开始信仰更加激进的非洲马克思主义(African Marxism)思想(郑家馨, 2010: 325-331)。在开普敦,非国大党开始大力倡导具有唯物论色彩的暴力革命,他们袭击银行、警察局,炸毁石油和煤气公司等殖民统治的实体机构,以推翻殖民统治秩序。库切从小学习英语,接受英国文化的熏陶,在文化和政治价值观上属于白人自由派,即政治上的改良派(王旭峰, 2009: 105-115)。虽然他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统治的暴政,但是对于南非左翼具有唯物论色彩的暴力革命主张,他一直持质疑态度。基于这种态度,库切很难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提供的方法论去呈现和诊断南非早期被殖民的历史。

库切的另外一部小说《彼得堡的大师》(*The Master of Petersburg*, 1994)中的相关文本细节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库切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疏离。在《彼得堡的大师》中,库切利用俄国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谢尔盖·涅恰耶夫之口对南非左翼唯物论进行了消解。小说中,涅恰耶夫被赋予20世纪后期唯物主义的色彩,大力倡导具有唯物论色彩的暴力革命。小说主人公即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极力反对涅恰耶夫倡导的革命。二人的思想多次进行激烈的交锋。以二人在地下贫民窟的对话为例。涅恰耶夫说道:“你没有认识到那些暴力,那些决定这些人现有生活的物质暴力!……政府、财政部、股票交易

① 为了反对南非白人当局推行充满种族歧视的“通行证法”,南非德兰士瓦省沙佩维尔镇的黑人于1960年3月21日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南非白人政府对这次示威游行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沙佩维尔惨案”(Sharpsville Massacre)。

所、商业银行……这一切导致他们赤贫的生活……如果你能揭示这些物质维度的话,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才算是清醒了。”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我只写我看到的,我看过来的那么多的物质暴力。”(Coetzee, 1994: 180-182)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库切的自我投射,而涅恰耶夫这个人物则蕴含了库切对南非左翼人士的讽喻。通过形塑涅恰耶夫这个人物,库切表达了对南非左翼唯物论革命的质疑(Attwell, 2015: 186)。这种质疑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与《幽暗之地》对于殖民暴力发生的“唯心主义”取向形成相互阐发和相互呼应的关系。

4 结语

历史地看,近代欧洲殖民扩张的发生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德里克曾中肯地指出:“不提到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联系,近代欧洲殖民主义是难以理解的。”(Dirlik, 2002: 441)因此,在对殖民主义的诊断和反思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是有力的思想武器。但是,小说《幽暗之地》将意义建构原则锁定了笛卡尔和尼采,疏离了马克思。在小说对殖民历史的重构中,殖民暴力仅仅被视为主体意志过度膨胀而导致的心理失常表现,与物质逻辑并无内在的关联。受作者写作立场的束缚,小说没有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提供的方法论去呈现和诊断殖民历史。小说对殖民历史的书写仅仅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书写。虽然这种书写对殖民暴力行为有所反省,但是没有能够触及殖民的政治经济学,具有将殖民主义行为“去历史化”的倾向,而帝国意识形态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将殖民主义行为“去历史化”(JanMohamed, 1985: 7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对殖民历史的重构方式隐含了库切作为南非白人自由派作家对于帝国意识形态既批判又妥协的矛盾态度。

参考文献:

- Arrighi, Giovanni. 2010.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 Attwell, David. 1993. *J. M. Coetzee: South Africa and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Attwell, David. 2015. *J. M. Coetzee and the Life of Writing: Face-to-Face with Time* [M]. New York: Viking.
- Brink, Carel Frederik. 1947. The Journal of Carel Frederik Brink of the Journey into Great Namaqualand [G]//Dr E. E. Mossop. *The Journals of Brink and Rhenius*. Cape Town: Van Riebeck Society.
- Coetzee, J. M. 1994. *The Master of Petersburg* [M]. London: Secker & Warburg.
- Descartes, Rene. 1984.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 vol. 2 [M]. John Cottingham et al. Tra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rlik, Arif. 1998. *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Dirlik, Arif. 2002. Rethinking Colonialism: Globalization,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Nation [J] *Interventions* (3): 428-448.
- Gordimer, Nadine. 1998. The Idea of Gardening: *Life and Times of Michael K* by J. M. Coetzee [G]// Sue Kossew. *Critical*

- Essays on J. M. Coetzee*. New York: G. K. Hall & Co.
- Gordimer, Nadine. 1999. *Living in Hope and History*[M]. New York: Farrar.
- Head, Dominic. 1997. *J. M. Coetze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anMohamed, Abdul R. 1985. The Economy of Manichean Allegory: The Function of Racial Difference in Colonialist Literature [J]. *Critical Inquiry* (1): 59-87.
- Kannemeyer, J. C. 2012. *J. M. Coetzee: A Life in Writing*[M]. Johannesburg: Jonathan Ball.
- Macherey, Pierre. 2006.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Parry, Benita. 1996. Speech and Silence in the Fictions of J. M. Coetzee[G]// Graham Huggan and Stephen Wats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J. M. Coetzee*. London: Macmillan.
- Vaillant, M. Le. 1796. *Travels into the Interior Parts of Africa by way of the Cape of Good Hope in the Years 1780-5*, vol. 1[M]. London: G. G. & J. Robinson.
- Watson, Stephen. 1996. Colonialism and the Novels of J M. Coetzee[G]// Graham Huggan and Stephen Wats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J. M. Coetzee*. London: Macmillan.
- 埃德蒙德·胡塞尔. 2002. 笛卡尔式的沉思[M]. 张廷国, 译.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 大卫·阿特维尔. 2017. 用人生写作的 J. M. 库切: 与时间面对面[M]. 董亮, 译.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 冯契, 徐孝通. 2000. 外国哲学大辞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 郝伟, 于欣. 2013. 精神病学[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 库切. 2007. 幽暗之地[M]. 郑云, 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 库切. 2013. 夏日[M]. 文敏, 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 卡尔·马克思. 20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特里·伊格尔顿. 2007.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 伍晓明,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旭峰. 2009. 库切与自由主义[J]. 外国文学评论(2): 105-115.
- 亚伦·贝克, 等. 2011. 精神分裂症——认知理论、研究与治疗[M]. 黎士鸣, 等译. 台北: 台湾心理出版社.
- 郑家馨. 2010. 南非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A Study of The“De-Historicized” Representation in Coetzee’s *Dusklan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LIN Ping

Abstract: Historically the occurrence of colonial expansion in modern Europ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J. M. Coetzee’s novel *Dusklands*, however, colonial violence is only regarded as a manifestation of pure psychological disorder, which is caused by excessive power will with no intrinsic relationship with capital and territory logic. Because of the constraints of the narrative position, the novel fails to diagnose the coloni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reveal its plundering nature. The representation of colonial history is “metaphysical”, which is de-historicized in nature and therefore incongruous to decolonization politics and implies that Coetzee has an ambivalent attitude towards imperial ideology as a white liberal writer in South Africa.

Key words: political economy; decolonization politics; “metaphysical”; “de-historicization”; narrative position

责任编辑: 冯革